

# 王蒙 精选集

世纪文学 60 家

---

王蒙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世纪文学 60 家

# 王 蒙 精选集



王 蒙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蒙精选集 / 王蒙著.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3

ISBN 7-5402-1776-6

I. 王… II. 王…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2056 号

责任编辑:马明仁 李瑞霞

特邀编辑:王 山

版式设计:王 毅

## 王蒙精选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海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1400×1000mm 16开 24.5印张 460千字

2006年10月第1版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2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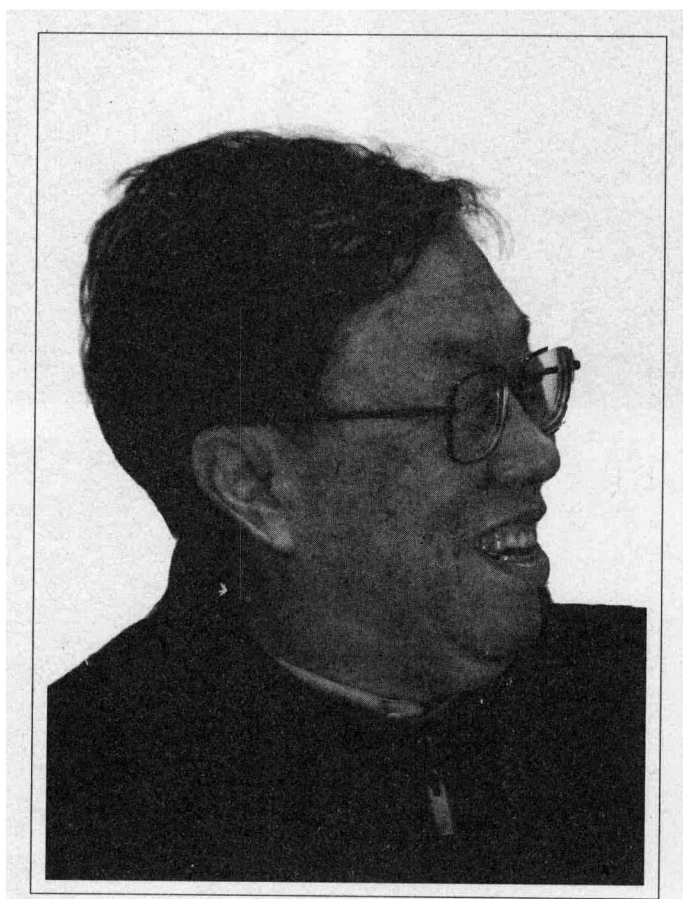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总策划：**

白焯、陈骏涛、倪培耕、贺绍俊、张红梅

**“世纪文学 60 家”评选专家名单：**

(以姓氏笔划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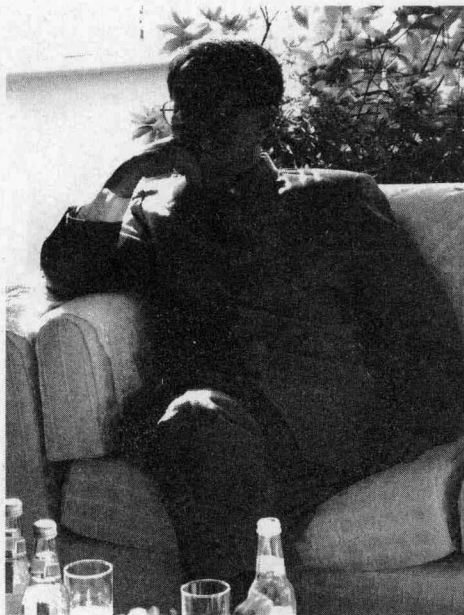
- |     |                 |
|-----|-----------------|
| 丁 帆 |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 王中忱 |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
| 王晓明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
| 王富仁 | 汕头大学中文系教授       |
| 白 焯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 孙 郁 | 鲁迅博物馆研究员        |
| 吴思敬 |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 陈思和 |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
| 陈晓明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 陈骏涛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 陈子善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



---

王蒙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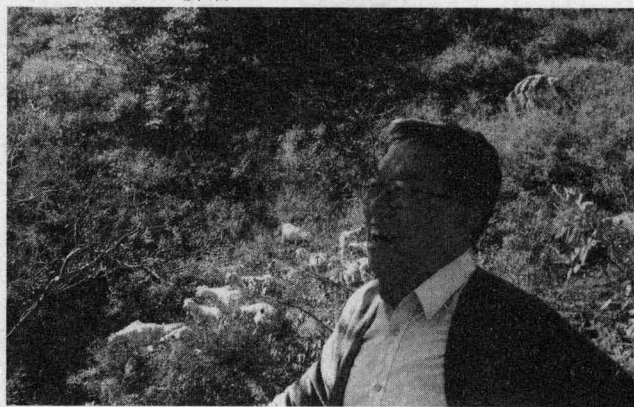
图片摄影：彭世团



思想



讲话



野外



接受采访

## 出版前言

20 世纪是一个不寻常的世纪。20 世纪的社会生活风云激荡,沧桑巨变,20 世纪的华文文学也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上承 19 世纪,下启 21 世纪的 20 世纪华文文学,在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连接和与时代情绪的遥相呼应中,积极地开拓进取和不断地自我革新,以其大起大伏、大开大阖的自身演进,书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华彩乐章中光辉灿烂的一页。这是一个古老民族焕发出青春活力的精神写照,更是一笔浓墨重彩、彪炳史册的文化财富。20 世纪的华文文学必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重要构成成为后世所传承,20 世纪的那些杰出的华文文学作品必将作为经典为后人所记取。

对 20 世纪华文文学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加以整理和出版,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要的历史任务。而且,在当下过于强势的“市场化”使文学生产日见繁杂,过于“娱乐化”的文化环境使文学阅读日见低俗的情势之下,这样一个以积累优秀文化成果、传扬经典文学作品为旨归的历史任务,显得越发重要和愈为迫切了。

2005 年春天,抱着共同的目的和相同的旨趣,以“世界文学文库”树立了良好品牌形象的北京燕山出版社,得到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核心的文学研究权威机构的支持和帮助,由著名文学批评家和出版家白烨、倪培耕,著名学者和文学批评家陈骏涛、贺绍俊总策划,开始了这项以“世纪文学 60 家”命名的策划、评选活动。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的创编与推出,旨在以名家联袂名作的方式,检阅和展示 20 世纪中国文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与长足进步,进一步促进先进文化的积累与经典作品的传播,满足新一代文学爱好者的阅读需求。为使“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的评选、出版活动,既体现文学专家的学术见识,又吸纳文学读者的有益意见,我们采取了专家评选与读者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秉承客观、公平、公开的原则,力图综合各个方面的意愿与要求,反映 20 世纪华文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形,体现文学研究专家的普遍共识和读者对 20 世纪华文文学作品的阅读取向。

基于上述评选宗旨和评选原则,经专家推荐,我们依据 20 世纪华文作家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经过反复推敲和斟酌,确定了100位作家及其代表作作为候选名单。其后,又约请25位中国现当代文学专家组成“世纪文学60家”评选委员会,在100位候选人名单的基础上进行书面记名投票,以得票多少为顺序,产生了“世纪文学60家”的专家评选结果。

为了吸纳广大读者对20世纪华文作家及作品的相关看法和阅读意向,我们得到了在国内最具人气的“新浪网·读书频道”的鼎力支持和全力合作,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华文‘世纪文学60家’全民网络大评选”活动。有数十万名读者踊跃参加和热情介入这一评选,有些读者还在留言板上发表了颇有见地的评论性意见,表现了他们对这一评选活动的关心,表达了他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富于个性化的思考。2005年12月16日,读者评选结果在“新浪网·读书频道”正式公布。

上述两个评选表明,尽管在选优拔萃、推举经典这个根本问题上,读者与专家在很多方面的看法是相近的,但最终的评选结果,还是出现了价值取向上的某些歧异。为了使“世纪文学60家”的评选与编选,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专家和读者两方面的意见,经过反复协商,我们决定综合以上两个评选结果,以各占50%的权重,得出了“世纪文学60家”的最终排名表(见下页评选结果)。

“世纪文学60家”书系入选作家,均以“精选集”的方式收入其代表性的作品。在作品之外,我们还约请有关专家撰写了研究性序言,编制了作家的创作要目,其意都在于为读者了解作家作品及其创作上的特点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提供必要的导读和更多的资讯。

“世纪文学60家”书系的出版,旨在囊括20世纪华文创作的精华,展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作品,打造一份适于典藏的精品书目。她凝聚了数十位专家的心血,寄托着数以万计的热爱中国现当代文学读者的殷切希望。我们期望她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淘洗,像那些支持这项事业的朋友们所祝愿的那样:“世纪文学60家”将作为各大图书馆的馆藏经典,高等学校文科学生和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书目为世人所瞩目。

2005年12月20日



# 王蒙：从纯粹到杂色

| 孙 郁

近半个世纪中国文学的风风雨雨，似乎都关联着他的名字。不论你喜欢还是拒绝，王蒙在这个巨变的年代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几乎熟悉他发表过的所有文章，那是个新奇、驳杂、阔大的世界，新时期作家还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具有那么大的热情和力量，他以一种激情澎湃和宽容大度的情怀，与众人一起，促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王蒙引起世人的关注，其实并不仅仅因为他的小说，坦率地说，他的小说缺少汪曾祺那样的经典性和纯粹性，他的诱人的地方，是其生命形态里系着中国政治风云与文化动态，他的言行折射着这个时代的矛盾、困苦乃至蓬勃的生命力。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他的名字不断地被提起，每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潮和重要的作家的出现，都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蒙是一个巨大的影子，在八九十年代，他实际在扮演着茅盾当年的角色：呼风唤雨，语出新潮，提携后进，指点江山……至少在相当长的岁月里，他被喻为文坛上的领袖，其文风和思路，差不多影响了一代文学青年。

我相信未来文学史对他的描述，可能是另一副样子。他在艺术演进与时代巨变中所承担的文化重荷，使他在观念世界里呈现的价值，恐怕远远超过其内在的审美价值。王蒙与他的同代人，完成了中国文学由浪漫的崇高，向多元的杂色的过渡，仅此一点，他便获得了一种“史”的意义。倘若了解共产主义文学精神在中国被解构的历史，王蒙提供给人的信息，比他同代的任何一个作家，都要丰富，都要多姿多彩。

无疑，王蒙是八九十年代中国作家最具魅力的人物之一。他不像平民作家那么单一，也不似先锋派艺术家那么孤独、超然。他身上折射着太复杂的因素：政治的、文化的、艺术的……从五十年代的“右派”作家，到自我放逐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新时期文学的精神突起，到上任文化部长的要职；从自动退居到逍遥地以写作为生，四十年的岁月沧桑，使他成为共和国文化变迁史的一个标本。阅读王蒙必须学会宽容与忍耐，他不会给你一个确切性的精神话语，他过于机智、聪慧，心灵深处是不羁的热情和俏皮式的反讽。他展示的是另一种的人生，



那种对苦难的态度,对恶的态度,对纯粹与永恒的态度,都远远不同于他的父辈,亦有别于他的下一代。他的背景、地位、创作实力,使他成为当代少有的可以居高临下地俯瞰人生的文人。他的每一篇评论,和每种重要言行,都被世人看成了代表什么,“动向”了什么,他渐渐地成了中国文坛“权威话语”的代言人,其语惊四座的咏叹,常常成为被关注的中心……

无论这一现状他自己是有意还是无意,他赢得了自我,但又常常坠入尴尬。他抵挡了什么,抗拒了什么,但同时又被抵挡着,抗拒着。他好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同时又失去了一些宝贵的东西。我在写茅盾的时候,常常想起王蒙,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文学史上这一现象的延续,是不是可以使人看到文化人内心最隐秘的苦衷?理解王蒙并非易事,不懂得政治、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在文人身上复杂的投影,我们对他的单一的情绪化的判断,都会失之偏颇。

我准备尝试一下,我相信与他的对话不能停留在单纯的价值判断上。

## 二

八十年代初,读王蒙作品的时候,我曾惊异于他的恢宏、高亢、洒脱的境界。那时候,当代的作家,还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给人以那么动人、神异的感觉。他写新疆牧场,写“右派”,写青年“布尔什维克”,使人看到了民族生活复杂的历史。我也正是通过他的文字,认识了五十年代,认识了“文化大革命”前后知识分子的命运。王蒙的情感是饱满的,苏联文学中的理想精神,与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苦难意识,那么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在王蒙那里,很少极其私人化、个体化的自语,这使他显得较为大气。他对个体生命的审视常常透出凝重的历史感和沧桑感。《蝴蝶》、《春之声》、《风筝飘带》、《杂色》、《如歌的行板》等,并不是以故事取胜,流动在那里的,是诗化的哲思、苍凉而奔放的交响。我觉得他生命的状态是大气与朗然的,那些闪着光泽的迷宫般的语句,把人拽向混沌、高远而神圣的领地。他怎么那样富有激情和想像力,在历史的苍茫与个体的微凉间,不是将己身引向灰谷、死灭,而恰恰是彼岸与未来?我在王蒙那儿期待到了一丝丝不绝的亮色。他作品中汨汨涌动的想像,把无奈与崇高,浑然地置于同一个调色板上。但那时他的文字纯粹多于混杂,明快高于抑郁,虽然常可以从中听到颤音,但它的雄厚气息,似乎把绝望、伤感的影子遮掩掉了。

从来没有一个当代作家,在那时明确地把“意识流”引入文坛,王蒙撕毁了流行了几十年的现实主义叙述模式,将一种杂色,掺入了艺术领域。

新时期文学在文体上的自觉,与精神内省的自觉方面,应当说始于王蒙。

这个贡献使他成为那一新的时期文艺革新的带头人。虽然这一革新还是浅

层的,但它为文坛后来大规模的艺术解构,创造了前提。

但很难说王蒙的发现与创造是来自深入的文化思考。他没有一套系统的文艺理论,他的全部创造力,来自于他心灵的感觉,自由的意志。他的心灵深处的冲动所散出的热力,比那同时代的许多理论家,要生动得多,丰富得多。阅读王蒙的文字,总难忘于他那汪洋大海般的激情,它永远在涌动着,澎湃着,没有静溢与恬淡。《青春万岁》是他十九岁时的产物,那时便可以看到他奔放不羁的个性了。直到一九七九年从新疆返回北京,他依然带着青春岁月的余痕。我一直认为作者结构故事不如其抒情笔致,他并不在意人物情节的离奇怪诞,而是要自由而潇洒地表现一种生命的状态。这一状态,使他无意中消解掉了理性主义模式,从而也使他获得了一种精神的自由。

革命理想、殉道意识、忘我精神、狂热的崇尚理性,这是早期王蒙世界核心的东西。我绝对相信这一切均是真实的。十五岁参加革命,变成地下共产党员,二十岁,成为北京东四区团委的领导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正是中国发生巨变的年代。共产党的革命风风火火,王蒙便卷入了这一历史的洪流中。他曾甜蜜地回忆道:

在建国初期,也许可以说是我们共和国的童年吧,节日的游行、阅兵和焰火晚会曾经怎样地激荡着人们的心!一进入九月份,国庆的准备工作已经使许多年轻人睡不着觉了,应该抬着怎样的图表和模型去向祖国汇报呢?应该穿哪一件毛衣、哪一条裙子来表达我们新中国的新一代的幸福和欢欣呢?要走什么样的步子,做什么样的动作,摆什么样的姿势让毛主席来检阅我们的精神面貌呢?一想起这些,我们简直兴奋得喘不过气来。

我们本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本来是“东亚病夫”,本来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本来是男人的长辫、女人的小脚、叉麻将的官员和抽鸦片的兵将……我们充满了悲愤,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去“向着法西斯蒂开火”,去迎接黎明。……多少先人望枯了双眼,多少烈士梦断了魂魄,终于,一九四九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摧枯拉朽的进军中,在军歌和腰鼓声中到来了,中国的天空,从此永远是“解放区的天”、“明朗的天”,到处是飘扬的五星红旗,到处是和时间赛跑的工农,是最可爱的人……而且有游行。在一盘散沙、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的废墟上,巨人般的新中国已经神速地挺起了腰!看天安门前吧,鲜花、红旗、气球、和平鸽、笑脸。“毛主席万岁!”一个口号表达着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亿万中国人衷心喊出来的正是这样一个口号。年富力强的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向着人民招手。“人民万岁!”毛主席呼道。这样的景象



可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和可能有的吗？还有阅兵，喷气式飞机、火箭炮和坦克，海、陆、空三军，那时候，甚至连坦克排出的瓦斯吸到肺里似乎也是香甜的，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强大武装、自己的装甲部队啊！入夜，探照灯的光柱交织在首都的上空，缤纷绚烂的礼花在我们的头顶上绽放，高音喇叭里播送着各民族的舞曲。也许，这些舞曲里最令人难忘的是新疆的迎春舞曲吧？多拉多拉，我们尽情地跳跃在五星红旗下面……太阳一出来，赶走那寒冷和黑暗！所有的交通工具都用来运送参加晚会的人民。快一点去，快一点站在圈子里，和你周围的男男女女拉起手来吧，我们都是亲人，都是同志，都有共同的欢乐和信念。

那是二十世纪中国大狂欢的日子，我至今仍从自己的父辈那里，感受到昔日的余温。王蒙正是在那时，接受了圣火。他的生命的天幕被照亮了。读一读他晚年写下的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便会感到那段岁月的脉脉情致。晚年王蒙回首往事的时候，虽然掩不住苍然之色，但对已逝的旧梦，还多少带有绵绵眷恋吧？这是他生命的底色，没有这种理想主义时代留下的“纯粹”，就不会有后来的王蒙。在社会变革的风潮中释放自己的生命欲求和永恒的梦想，这是他，以及他那一代许多“布尔什维克”共有的人生追求。

### 三

但一九五八年的“右派”帽子，使他的狂热第一次受到冲击，直到去新疆与少数民族的农牧民们生活在一起，在边陲整整生活了十六年以后，他才从另一个角度，懂得了生活。王蒙思想上的成熟，应当说是从新疆那里开始的。他从底层人的苦难中，意识到了什么，感悟到了什么，他的理想主义，入世的儒家情感，开始饱受着风雨的袭侵。但王蒙之于新疆，与张贤亮、从维熙那些“右派”之于农场，并不能相提并论。我一直把此行看成他自我“放逐”。独闯新疆，其实对他意味着一种浪漫的逍遥，他其实是为了寻找一种生命的诗意，才到那里的。新疆拯救了王蒙，他后来说：“不能简单把我去新疆说成是被‘流放’。去新疆是一件好事，是我自愿的，大大充实了我的生活经验、见闻，对中国、对汉民族、对内地和边疆的了解，使人有可能从内地——边疆，城市——乡村，汉民族——兄弟民族的一系列比较中，学到、悟到一些东西。对于去新疆的干部、作家、群众……都对我很好。”读那一代“右派”文人的作品，大多是凄怨、残酷的，那是沦为底层的中国知识分子悲惨的歌哭。而王蒙完全是另一种调子。苦难成了他的财富，他不神经质或孤独地自言自语着。王蒙的小说中总奔涌着滚滚的生命热力。他将

忧郁、多难的历史变成激越澎湃的如歌的行板。在他最感伤的叙述背后，似乎总有一种期待，一种自救，一种洒脱的逍遥。他从不哭哭泣泣、哀哀怨怨地说：我痛苦极了，我绝望极了，我不能活了。王蒙以明快的幻想和狡黠的自嘲，超越了以往小知识分子的烦恼。读他的文字，不能不惊叹于他的达观与豁然，他习惯于自由地抒发胸臆，并不愿陷入狭窄的痛感的吟哦里，写作对他意味着“为了心灵的自由驰骋，为了把哭、笑、痛苦、嘲笑、思索、爱情、平静、宽恕和自信写它个淋漓尽致”。这是自由的心态，是老庄、李白、普希金、法捷耶夫以来，一切显示大气的文人所共有的心态。王蒙承认自己是热爱生活的人，知其不可而为的儒家通达、乐天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他的生活，他在知识世界里给人的东西是有限的，但他的生命状态、思维方式乃至语言表达方式，时常给人以惊奇与爽然的一笑。王蒙最初吸引我的，便是这种诡谲幽默、汪洋恣肆的情致。他渐渐学会了超然于象外，学会了以多样性、复杂性、广博性来驱赶心灵的寂寞。我觉得他的这种选择是机智和聪慧的，但他既获得了心灵的抚慰，又因为过于圆滑而失去庄重。一切选择都将付出代价，王蒙在精神的跋涉中，既找到了归宿，又渐离了故有的家园。

选择了杂色作为自己世界的主调，既有与现实妥协的一面，但更主要的，还是对存在的宽容与理解吧。我注意到他对各层次人的态度，注意到其作品中的党员、干部、农民、知识分子诸种形象，他似乎能从各个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意义，虽时常夹带讽刺与幽默的调侃，但他不拒绝众生，在他骨子里，与生俱来地具有一种热情、好奇、理解他人的东西。在新疆的十六年，他一方面承受着政治阴影下的压力，但更多的，还是在底层获得了生活的快意。阅读那些关于新疆岁月的回忆文字，我感到他诗意的享受和无边的眷恋。他将新疆称为“在孤独的时候给人以温暖，迷茫的时候给我以依靠，苦恼的时候给我以希望，急躁的时候给我以慰安，并且给我以新的经验、新的乐趣、新的知识、新的更加朴素与更加健康的态度与观念的土地”。王蒙内心深处的迷茫，常常化解在异地乡俗的迷人的情境里。他在世俗中发现了美，在朴素、自然、开阔的民风中找到了快意。他从民间的自娱中，找到了超越苦难的精神之光。他学会了奔放热情，“自唱自调，如入无人之境”的洒脱。也许，在苦难中跋涉的人，最渴望的是了解、默契、知心，王蒙在“他”的世界里，好像找到了这一切。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大多都在找一个寄托。刘绍棠有他的“运河”，浩然有他的乡土，王蒙呢，有他的理念，他的新疆，他的“布尔什维克”队伍。读这一代人的作品，绝没有“无根的漂泊”的苦闷。在他们那里，“上帝”还没有死，因此，即使像王蒙那么“新潮”，但也绝看不到鲁迅、萨特式的绝望。王蒙曾眷恋过头上的星空，也眷恋过脚下的大地，而更深切的，是眷恋着生命的本体。他永远不会自虐，不会孤芳自赏地躲在书斋里。他时时关切着远方的人们，关注着与自己休戚相关的实在。在经历了多种厄运之后，他学会了忍耐、大度，他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发现人生，发现美。例如，



回忆边疆生活的时候，他叹道：

骂“村干部”之风源远流长。至少国民党时候就骂，流风余音至今不止。但谈起“村干部”来，我总替他们有点叫屈之感，他们不容易。记得那时有一句俗话，说这些农村干部是春天的红人（择优选中），夏天的忙人（当然），秋天的穷人（拿什么分给社员们呢）、冬天的罪人（冬天搞运动，他们自然是“运动员”）。我特别同情他们，可能是因为我毕竟与他们朝夕相处，同流共事过吧。

许多从“右派”生活走过来的人，都未这样以同情的目光写过“干部”。王蒙早期的单一思路，在现实面前崩解了。现存世界决不像感伤主义文人理解的那么简单，王蒙相信世界由杂色组成的。那里有黑暗、有陷阱、有美丽、有庄严。但他在那里发现了梦想。他相信人可以在混浊、灰暗的时空中以搏杀、探索而找到升华自我的道路。与那些拘于风花雪月的琐屑的文人比，他拥有了一种磅礴的气度，而这一点，正是许多文人所不具备的。

#### 四

王蒙在本质上是诗人气的，但他特殊的经历，使他温和、坦然的个性里，迸射着一种复杂的情感。我觉得他是较了解中国国情的少数文人之一，他几乎感受过各个层次人的生活，对世相种种、官场种种、文人种种均有相当的了解。一个深味世态的人，常常不会以一只眼睛打量世界，他越来越感到生活的荒诞、文化的荒诞、存在的荒诞。于是他出语讥人、圆滑幽默，他调侃戏弄世间也调侃戏弄自己。于是有人说他官腔、世故、无节操……其实王蒙在内心深处有着深切的忧患，不过表现方式过于闪烁而已。我常常在他那里感受到一种沉重，一种无言的哀凉。也许，世人对他的许多批评是对的，比如圆滑、中庸等等，但倘看不到他埋在“魔术师”下面的无奈、悲愤，大概也难走进他的世界。

《活动变人形》是王蒙较为成功的作品，我在这里看到了鲁迅的某些影子。他对老中国儿女劣根性的洞悉是入木三分的。在人性的世界里，他看到了那么多的丑陋、阴暗，早期记忆中的苦涩，差不多都涌到了笔端，我相信他深味市井世界最残酷的东西，看他写人的尖酸刻薄，已能感到内心的沉重。但他很少把自己燃烧在作品里，他往往跳将出来，以居高临下的目光，抽打着芸芸众生。在那一组组可恶的画面里，我读出了杂文笔法，相声段子，魔术师的诡笑。他不是托尔斯泰，所以不真诚地忏悔，不乞求上苍；他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以难见非理性的自语和灰色的痉挛；他也不是鲁迅，所以在最绝望之中不会孤独地肉搏惨淡的

暗夜。王蒙的世界是驳杂的，他在依恋中绝望着什么、在达观中哀伤着什么，他把幽默与严肃、通俗与含蓄、崇高与凡俗和谐地杂糅在一起。他失望于国民劣根性的鄙琐，但却不是直面前行，而是峰回路转。《活动变人形》对中国人性格中丑陋的、无可救药的性情的批判，已显示了他的这一审美风格。在对国民精神深层因子打量的那一瞬，他不自觉地汇入了鲁迅传统。但他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调子并不是沉郁的，在他的笔下，可以聆到一种鲜活的声音，至少“叙述者”本身饱含的激情，常可以把小说的忧郁驱走。

这是王蒙式的机智，我从未将其作品看成是纯粹的艺术来读（如对待沈从文、汪曾祺那样），王蒙从不会给你闲适中的回味、咀嚼，不会像清风一样把你吹到过去，吹到田园之中。他那儿总疏散着对现实、对人生的理性精神，疏散着鲲鹏展翅扶摇直上的人间情怀。读王蒙，我其实更感兴趣的是他的心理状态和审美状态，那种纷至沓来的意象，酣畅淋漓的抒怀，与阴郁、单一、萎缩的国民性格，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照！王蒙的世界比乡土艺术多了开阔，比市井文学多了野性，比感伤的诗作多了热情，比凄怨的夜曲多了些亮度。王蒙是粗糙的、感觉的、无雕虫小技而多逍遥之咏，虽伤痕累累，捉襟见肘，但他的吞云吐月、纵横捭阖的气魄，是“五四”新文学以来少有的景观。

王蒙的诱人在于他的存在状态，以及他的理性达成方式。我以为看他有关政治、文化、艺术的思考的文字，比其小说写作更有趣味。他对国民性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历史问题，艺术创作问题的见解，都影响着文化的进程。中国有无数的教授、学人，却很少有人像王蒙那样，直接以自己的思想，推动一种风气的流行。王蒙在解构着一个时代，同时又在为建设着一个新的文化奔忙着，这一点的意义，已超过了小说写作的自身。他不执著于一个主义，一种观点，对虚幻性与实在性，有着较清醒的态度。他把幻想由天上还原到地面，又把世间之乐推向天空。王蒙在微笑在颠覆着自己的昨天，颠覆着他曾认可、曾履行的事业。他对旧物很少决然的离别，而是温吞的告辞，例如对毛泽东的态度，对“费厄泼赖”缓行与否的态度，对“躲避崇高”的态度，都是温和而平淡的。他在以肯定的方式否定过去，而不是以否定的方式去建设或肯定什么。例如对“人文精神”的思考，对王朔现象的思考，对“不争论”的思考，几乎看不到一丝独断主义的影子。在一篇文章中，他说：“我得益于辩证法良多，包括老庄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革命导师的辩证法；我更得益于生活本身的辩证法的启迪。所以我轻视那种哩哩罗罗，抱残守缺，耍丑售陋，自足循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其三的死脑筋。”这看似老奸巨猾的变通，实则是对自己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反思后无奈的选择。他讥讽“红卫兵情结”与封建余绪时，是何等语重心长，但对自我深层的东西与文化母体结症的东西，便不免闪烁其辞，在心灵深处，还留着一块园地。在这个园地里，他以幽默支撑着空间，他以“从容”、“平等”、“超脱”、“游刃有



余”、“聪明透彻”消解着拘谨、失态、仇视、绝望。王蒙的境界确是超出了常人，说其虚伪、假态、失节，都难以规范其内心形态，我认为在他的世界里，交织着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妥协，平民与贵族的妥协，本土与域外的妥协……中国现代文化的挫折感被他重新调节到一种开放、宽容、多元的态势里。以此来重塑国民性格，在他看来，是不得已的现实选择。

## 五

但这一选择是痛苦的。他时常陷入“左”、“右”两种势力的夹击，消失了“纯粹”与“确切”的王蒙，不会得到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认同。这使我想起胡适晚年的处境，当一种平和、自由主义的文人用建设性、理解性、兼容性的思路构建新的文化形态时，当这个民族恰恰缺少建设性、理解性、兼容性的传统的时候，其提倡者的路，是可以想见的。我赞同他对“红卫兵情结”的批评，赞同“对王朔的理解”，他对“人文精神”讨论中的偏执性因素的指责也是中肯、深刻的。但他的“左右逢源”式的话语方式，激怒了成千上万的文人。在“不合理”、“不健全”还司空见惯的年代，居然有毁灭“崇高”和“理想主义”的论调，王蒙是不是成了“渐入颓唐”的老人？王蒙的境遇不免苍凉，他受到各种势力的挤压、误解、痛恨、围剿……他似乎陷入了独战的苦痛。

我从他的许多文字中，可以依稀体味到这种苦境。他的文章不免也流出了寂寞之感。他对毕加索的感应，对嵇康、阮籍的理解，对曹雪芹的共鸣，那其间，便有难言的感叹吧？《名士风流》一文叹息“士”的无奈，其中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影子？九十年代中期他遭受的连连抨击，正是他的价值选择的必然结果。他已深深尝到围剿、中伤的疼痛。围绕《坚硬的稀粥》那一场官司，王蒙似乎有些被激怒后的失态。中庸、宽容对他并不容易。中国文化是向来难容第三种选择的，苏纹当年欲做“第三种人”时，不是也遭到四面的夹击的压力？在一定意义上讲，王蒙的境界是超前的，在世人均讲艺术的功利性或非功利性时，他则展示了艺术多元功能的可能性；在世人慌慌然寻找新理想主义的时候，他说出躲避崇高的价值；在人们纷纷崇拜域外文明、“精英”化贵族化的时候，他却肯定了中土的某些世俗文明……我相信一个健康的民族应当具有王蒙这样的胸怀。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王蒙的背景、王蒙的视野、王蒙的先觉条件。当他居高临下地直陈胸臆的时候，无数在底层挣扎、困顿的文人觉得王蒙正走向贵族，他正代表着贵族宣读着平民难以忍受的信条。在腐败、堕落尚未根除时，难道不需要理想与节操？在知识分子越来越边缘化时，难道不应高唱人文主义的歌调？人们对王蒙的抱怨，正如当年“左联”对梁实秋的抱怨。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左翼文化不相信“永久的人性”，王蒙不幸在晚年扮演了“超意识形态”的“永久的人性”鼓



吹者的角色。我相信这位前文化部长与自己的对立面水火难融，这是两个不能对话的世界，它无法构成统一的话语场。煤油大王不会懂得捡煤渣的穷人的苦乐，而王蒙所期待的，是捡煤渣者也有煤油大王的生活。这是一种历史的错位，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使自己不再是无产阶级，王蒙不幸先走了一步，而后面的人却把他视为远行的叛徒。当他看到爱于斯、恋于斯又恨于斯的同营垒者背离而去的时候，我似乎感受到他内心的苦寂。丰富的智慧是痛苦的，他的自言自语中，似乎响着一丝孤傲的哀凉……

鲁迅当年形容自己曾陷入无物之阵，在孤独前行的时候，四面是灰土、灰土……周作人也谈及这一感受，当“左派”“右派”均说他不好的时候，他竟大谈起草木鱼虫。绝望的反抗者如鲁迅，宁静超然的自娱者如周作人，其实都在为高山流水知音少而沉默。王蒙晚年的尴尬，便有这类的苦涩吧！我相信他的选择比激进主义、保守主义更具风险，这是他的价值世界必然的规范。如果不是背负着一个民族的责任，对一个社会稳定与发展的责任，他完全可以成为单纯的逍遥派或反对派。但他是新式的“布尔什维克”，他既要保存自我，又要发展社会，既要坚持什么，又要放弃什么，他不会彻底地放逐自我，走向人性的荒野。因为这个世界还需要温情，需要游戏，需要友爱。王蒙的复杂性正在这里，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都留在了他的世界中。我从他那里看到了革命的神圣与非革命的洒脱，精神的放浪与道德的守望。中国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代的文化矛盾，都弥散在他的艺术空间里。他想拆卸什么，修补什么，在两难的困境里，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园地。

王蒙身上牵扯着真谛与俗谛的长影，从共产主义到非共产主义，从殉道精神到平民乐趣，这种不和谐的旋律在他那儿竟和谐了。一个杂色的世界会拯救我们么？王蒙的选择具有可行性么？他会不会像茅盾那样，也走向深深的寂寞的命运？这恐怕连他也无法回答吧。